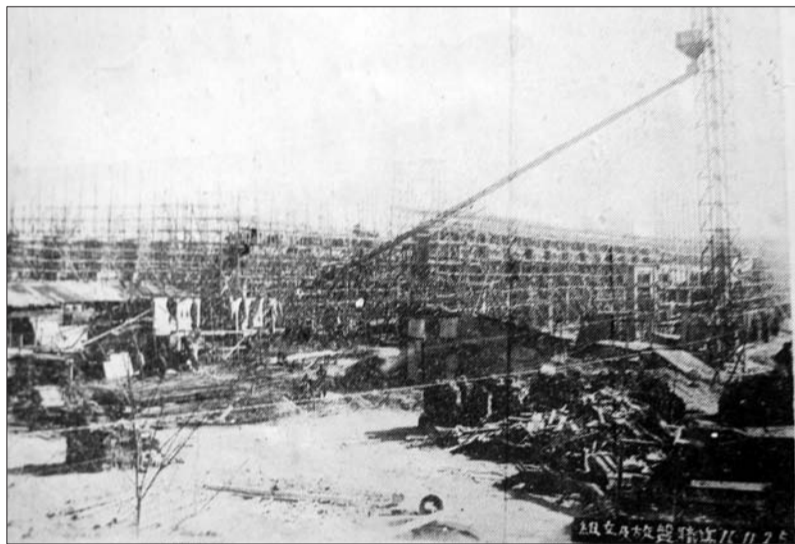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东抗战那些人那些事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“南迁”成了那个时代的脚步。从北京南下400多公里，山东只是一个转往下一站的站台——和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人一样，更多的人在南迁的路上颠簸，就像王献唐护书南下，承受着战争带来的衍生灾难。1937年的胶济线很忙，这条南迁的漫漫长路，成了那个时代的人逃避战争、背井离乡的一个记忆载体。78年后，我们来到青岛，试图从那个记号的开端，拨开一条线，穿越光影，找寻逐渐模糊的记忆。

青島四方机厂“走四方”
“背着火车”
南下避难



日伪时期，四方机厂内建的机车车间。(资料片)

建议：“不将设备留给日寇，要保留力量。我们搞工业的，理应服从命令，员工与机器都应全部撤离，易地生产，决不让日本人所利用。”

没想到，侵略者来得如此之快。1937年8月14日下午，日本陆战队一小队士兵擅自登陆在青岛到处乱窜，行至德县路圣功女中门口时，突然几声枪响，日本兵一死一伤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德县路事件”。事件发生后，停泊在海上的十余艘日本军舰上，扬言报复的声音不断传入青岛市区。

“若日军登陆，南迁就更无望了。”顾榭当天就找到了时任胶济铁路局局长朱宝芬，陈述南迁之事。朱宝芬说：“你们讲的迁厂意见是对的，还是按照国民政府铁路部的命令办吧。”

接着，顾榭又向时任四方机厂厂长栾宝德进行了汇报，栾宝德其实无心搬迁，他见路局已同意，故声称：“你副厂长可代表厂长行使权利，你们搬吧。”

于是，顾榭等人又急忙赶回四方机厂，连夜布置。抗战时期的南迁，多数都是匆忙开始的。

1937年8月14日，当顾榭等人急匆匆赶回四方机厂后已是深夜了。他们立即找来车间主任和工程司有关人员到顾榭家中开会，对南迁方案达成共识：连夜装车，如大的机器设备搬不走就炸掉，将有价值的能用的机器设备立即装好，绝不能给日本侵略者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。

当时，到场装车的技术工人有100余人，大家一直忙到午夜，工人们带着家眷及简单行李上了车，并登记造册。

据历史档案记载：当夜装车的有第二工场93台机器中的70台，以及机器的刀架或床身等主要零部件，车轮部分除车轮箍加热炉以外的全部机械及起重天车；动力及锻工等场有176马力电动空气压缩机1台，80千瓦电动机1台，蒸汽锤2台，空气锤1台，铸钢用转炉及附属设备和部分线路钢轨等。就这样，一共弄了3列火车，看起来很像是火车拉“火车”。

身在济南的时任路局委员长葛光廷给栾宝德打了一个电话，说：“决定搬迁是按国民政府铁道部指令办的，但现在胶济铁路还没有停运，四方机厂的工作也不能停，已装车的先运到张店机务段作为四方机厂的一个分厂，由顾榭带队负责，未拆装的仍坚持生产。”

大约过了一个星期，顾榭带领100余人护着装运的列车转到了淄博张店。

不断流动的机车厂

从青岛到淄博张店，只是南迁的开始。1937年9月中旬，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、天津，又占领张家口，并逼向涿县、保定、德州等地。

时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路政司帮办杨毅奉命来到济南，与葛光廷等人面谈：“为保存全国第二大的铁路设备制造厂，四方机厂必须搬迁到株洲去，三分之二由顾榭带到株洲，三分之一到西安、洛阳、江岸等地。”

不到一个月后，顾榭就带着60余名员工护送着3列火车的机器设备到了株洲机厂。

据有关文献记载：“七七”事变前，胶济铁路全线共有机车107台，客车213辆，货车1858辆，除破残者外，全部转移完毕。

德州沦陷后，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一样，青岛市长沈鸿烈也决定不战而退，并实行“焦土政策”。

1937年12月18日晚8时，他下令将市区日本八大纱厂以及四方发电厂、两个自来水水源地和青岛港码头设备实施爆破，并将胶州湾内的中国海军第三舰队与其他20余艘船只凿沉于主航道上。

12月27日，日本兵侵占济南。当天，沈鸿烈率领军政官员、眷属弃城而去，南去徐州。

如今，见证那个时代的人多已凋零。我们只能从这些先辈的后人口中，对这段支离破碎的历史略窥一二。

如今的青岛市海岸路18号，在那个时代是四方机厂西宿舍。从小居住在这里的朱烽说：“他爷爷朱仪亭当时是四方机厂的绘图员，青岛沦陷前带着一家人逃回了老家。”



陈光荣手指的这张照片就是日伪时期四方机厂的大门。 刘志浩 摄

就在沈鸿烈逃离青岛十四天后，1938年1月10日，青岛沦陷。而千里之外的株洲，顾榭他们开始赶工安装机器设备，五个月后就开始了开工、生产。

好日子没过几天，1938年8月，日军轰炸机连续不断对株洲机厂进行轰炸，厂房尽毁。所幸，机器设备还没有什么大的损坏。国民政府交通部立即发电给顾榭：株洲机厂的机器设备及车辆等搬迁到广西兴安存放起来。

兴安，北到株洲约400公里，南到桂林约有60多公里，是湘桂铁路沿线一个较大的车站。由于山高林密便于隐蔽，国民政府在此修了多条存车线。继续南迁！从当年10月开始，所有机器设备拆卸、装车，由四方机厂南迁的60余名员工逐步护送到兴安。

当“焦土抗战”中最具恶名的“火烧长沙”发生时，顾榭等人正在株洲机厂，只见长沙方向一片通红的火光。长沙大火熄灭之后，方才找到了陈孝刚和原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等人，石志仁说：“日本人暂时不来了，你们还是抓紧搬迁吧！”直到1939年1月，株洲机厂的厂房、设备、机厂才全部搬迁到了兴安。

无奈中推车入江

时光一晃70余年，顾榭早已辞世离去。如今，我们只好猜想：南迁艰难，顾榭起初路上受的罪，或许在当时的他们看来“无所谓”。而真正让他痛心疾首、捶胸顿足的是，一路奔波过后，在战争面前，所有付出都无果而终。

1939年上半年，在兴安，根据国民政府交通部的指令，顾榭等人筹备建立起了柳江、贵州、贵定三个机车厂。

从1942年12月开始，日本大举进攻湘桂黔，国民党军队一退千里，1944年11月10日，日军侵占桂林、柳州。

在日军来犯之前，顾榭等人在兴安又呆不住了。1944年，按照上级的指令，顾榭将所有的机器设备和工人编成两列车，沿着湘桂黔铁路向西撤退，一直到了金城江。

500公里的路程，迁徙车队走了一个多月。火车一辆顶着一辆，比老牛拉破车还要慢。更为悲惨的是，火车到了金城江，没有煤供应了，顾榭和工人们就烧枕木，后来枕木也没有了……

1944年3月，为避免这些机器设备和列车落于日本人之手，国民政府下令，在广西金城江将顾榭等人拼着性命带来的机器设备全部损毁。

“一路颠沛流离，仅存的车辆、设备都被推入了滚滚江流，这是一种什么感受？”作为四方机厂的员工，陈光荣用自己对待铁路、火车的感情，极力寻找当年顾榭的感受。

没有了机车、设备，顾榭等人过起了流亡的生活，最后流落到了贵州麻尾、贵阳等地，靠救济费度日。跟着顾榭从四方机厂迁来的60余名员工，失散了不少，到了麻尾只剩下20余人。

从那以后，顾榭或许都活在对“罪”与“罚”的思考中。四方机厂南迁的故事都随着时间沉入在金城江的江底，直至1986年顾榭见到陈光荣，才逐渐浮出水面。

用陈光荣的话说，如不及时记录，若干年后，时过境迁就难以补救了，那才是最大的遗憾，更对不起那些做出贡献的人。

在青岛，我们沿着杭州路附近的四方机厂员工居住区寻找，试图找到一些走过那个时代的老人，能映照顾榭曾经的记忆。百般打听后，终于敲开了一扇家门，也是唯一一扇。年近90岁的老人冲我们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记不好了……都忘记了……”

老人是那个时代四方机厂的一名职员。一直住在四方机厂宿舍的朱枫告诉我们，他爷爷朱仪亭曾经和这位老人在那个时代共事过，当过绘图员。朱仪亭早已去世，老人或许是那个时代唯一的见证。

“时间和记忆难以分割。”米兰·昆德拉的《慢》中这样写道，“使时间具备形态需要记忆，因为没有形态的东西无从捉摸，也难以记忆。”

我们唯一能够为那个残酷的时代所做的，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，抛开所有自以为重要的事情，用最谦卑、最柔软、最慈悲的心，去倾听。

感谢青岛四方机厂史志办退休工人陈光荣为本文提供资料支持。

山东抗战线索资料征集，邮箱：liuzhihao333@163.com

“烽火家园”山东抗战系列报道诚邀商家冠名，详情联系：0531-85193172

抗战日记(二)

苏蕴山
原115师司令部机要科长

- 11月
- 1日 到沾尚镇，25里。
- 2日 移广阳，20里。
- 3日 到卷峪沟。
- 4日 “广阳战斗”。仍在广阳村。是日是广阳战斗的一天。是日晚将进攻太原之敌尾后打溃，俘获甚多，活捉生俘日兵2名，骡马颇多，枪支一部。
- 5日 到黑土峪，本日是尾击敌人。
- 6日至7日 都在黑土峪。
- 8日 到班坡墙，移4里。
- 10日 到龙王村，70里。
- 11日 到仰天村，12日同。
- 13日 到黄村，40里。
- 14日 休息
- 15日 到姜村，70里。
- 16日 到浦上。
- 17日 到沁源县城，50里。
- 18、19日 休息。
- 20日 到元驿，50里。
- 21日 到素村，50里。
- 22日 到鱼村，60里。
- 23日 到马牧村，60里。
- 23日至30日 在马牧村休息。
- 12月
- 1日至31日 在马牧村休整，在该地过的新年。
- 1938年 1月
- 1日至15日 都在马牧村，共53天。
- 16日 到崔家村，走20里。本日到了(343)旅部工作。
- 17日 到滩里，行60里。
- 18日 到北掌，75里。
- 19日 到双池镇，60里。
- 20日 到吕居堡，60里。
- 21日 到部落村，40里。
- 22日 到石庄镇。
- 23日至30日 在该镇休息。
- 30日 在石庄镇过旧历年。

(未完待续)
资料来源: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《齐鲁烽火》杂志

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刘志浩

寻找顾榭

王家卫导演的《2046》里，开头有一行字转瞬即逝：“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。”就像陈光荣正在呼吸的青岛2015年4月1日的雾蒙蒙、湿漉漉的空气，让他回想起30年前的“打捞记忆”。今年他60岁。

我们认识陈光荣，缘于他一篇关于抗战时青岛四方机厂南迁的故事。

“对于这段史事，岛城人了解得不多……”这是《抗战时期四方机厂南迁记》的开头，也是陈光荣30年前就有过的无奈。

1985年3月，陈光荣从部队转业到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工作，从事该厂的史志鉴编写。当时的史志，多见物不见人。在陈光荣如今看来，“只求群体，没有独立的个人，陷入了虚无缥缈之中。”

找寻、记录经历那个时代的人，成了陈光荣在上世纪80年代的选择。

“很难，确实很难！从青岛到济南，从南京到北京，不断找资料。”坐在我们面前、白发稀疏的陈光荣回忆当时，一直苦笑。

翻开《四方机车车辆厂志》，“工厂大事记”这样记载：“1937年下半年，工厂部分人员在副厂长顾榭等人带领下南迁。”“顾榭”这个名字在陈光荣脑海里印下了深深痕迹。

能找到顾榭，是陈光荣的幸事。

1986年5月，北京复兴门外，沿着南礼士路一直到复兴路，陈光荣每天都奔往铁道部档案馆，搜集关于抗战时期四方机厂的史料。突然一个名字映入了陈光荣的眼帘——“顾榭，铁道部科技局高级工程师”。

“终于找到了！”兴奋的陈光荣一下子从档案馆的椅子上跳起来，忍不住喊出的声音幸好被椅子腿儿拖拉地板的响声遮盖了。

见到顾榭，是在当月23日。

陈光荣至今仍清晰地记着顾榭诉说南迁经历的场景。他用手擦拭眼角，极力模仿顾榭当年与他见面的样子：“82岁的老人，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事情，依然老泪纵横，不断用手擦拭泪水……”

火车拉“火车”

顾榭流下的泪水，是深埋在他心底的痛苦：既是对南迁中所受“罪”的倾吐，也是战争留给一个普通人一辈子的“罚”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国民政府为保存经济命脉，决定加速将沿海厂矿、企业、商业等向内地迁移。在那个时代，中国南方和西北还没有像四方机厂规模的铁路工厂，而北方的铁路工厂全被日本人占领了。

当时，顾榭和四方机厂的同仁向路局